

# 不忘合作初心 继续携手前进

吴佳

今年是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5周年,中央统战部宣传办公室联合中国新闻社制作了8集系列专题片《大道薪传——中国的民主党派》,邀请各民主党派新一届中央领导同志集体出境,以“第一视角”讲述实践与传承的故事。看完专题片,感慨良多,回顾民建同中共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光辉历程,结合我曾祖父、民建创始人之一吴羹梅的亲身经历和我本人的感受,书写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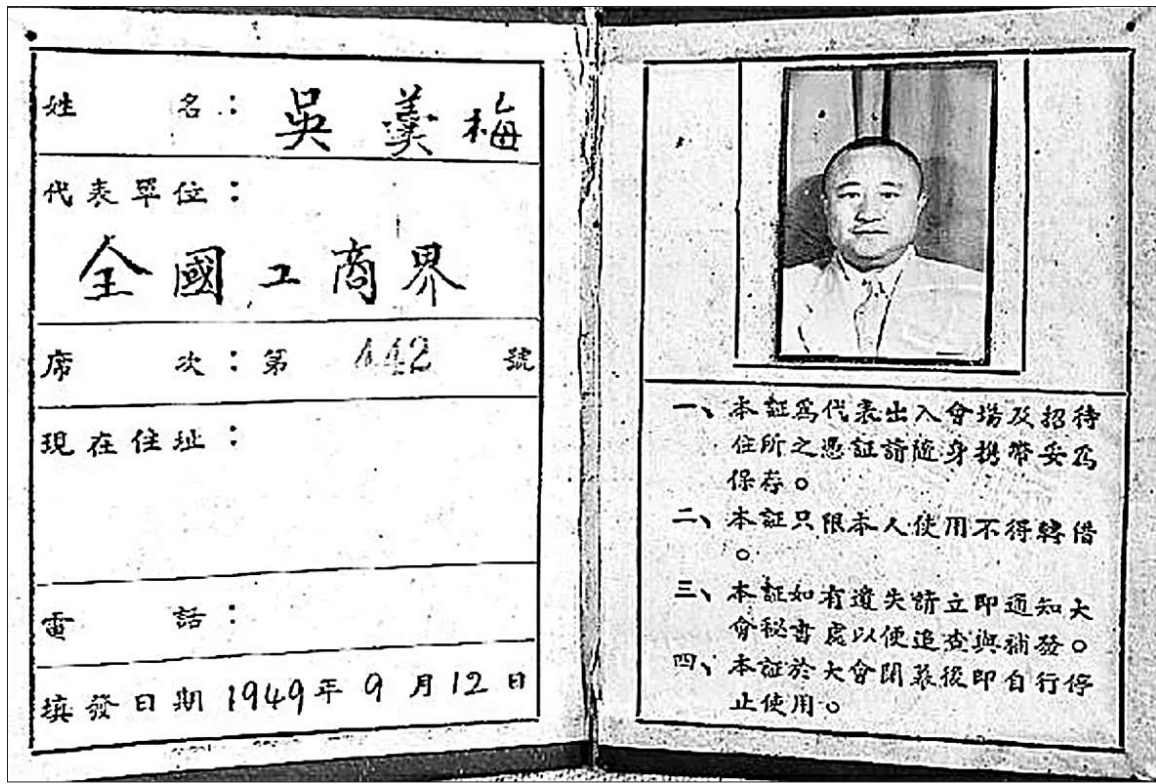
## 与共产党相知

抗战期间,民族工商业艰难地维持着,期待抗战胜利的尽快到来。1945年8月17日,在工商界召开的星五聚餐会上,我的曾祖父吴羹梅发言呼吁工商界要“不容一刻迟延”地行动起来,联合发表共同宣言,争取权利。他在发言中道出了民族工商界所面临的危机,也表达了民族工商界共同的忧虑。他说:“我们固然相信当局在今天不至于因为抗战胜利了,后方民营企业成为累赘,就把我们丢弃了。但客观现实使得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今天我们要参加政府一切复员计划,希望当局不要尽派些大官要员。民营工业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尚且对得起政府,今天抗战胜利了,更不会对不起政府。”

在另一次星五聚餐会上,吴羹梅发言激烈地抨击国民党政府在胜利后的所为。他说,中国虽然有总动员法颁布,其实从未动员,甚至反而抵消了一部分力量。现在胜利来临,从沦陷区获得一批资产,应该好好地干,不要接收了台湾、东北反而不能维持,总要超过空耗。八年来不合理的法令与税制都应取消,与民更始,来个战后动员。胡厥文也发言批判政府接收、复员工作的不力。这些充分表现出民族工商界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和愤懑。施复亮更为明确地说:不论讨论几个纲目,最后必然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工业界自己首先要团结起来,共同争取政治民主化、经济民主化,合此之外,别无途径可循。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不顾民营经济的死活,一方面允许军货大量倾销,一方面又取消订货合同、停止原料供应,同时借“接收”敌伪财产之机侵吞民族工商业者的资产,使民族工商业身陷困境。在此情况下,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及胡西园、吴羹梅、李烛尘、刘鸿生等会同迁桂、迁湘各厂负责人召开内迁工厂联合会会员大会,全国工业协会总会召集了工业界核心人士座谈会,商讨应付困难的办法,并推举刘鸿生、李烛尘、胡西园、胡厥文、吴羹梅等作为工商界代表,多次与国民党政府交涉,但国民党政府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交涉没有取得结果。之后,胡西园、胡厥文、吴羹梅3人要求面见蒋介石,蒋介石迫于进步力量的抨击和各界舆论的巨大压力,被迫接见了代表,但仍然没有答应代表的要求,使民族工商业者感到极度失望。

面对国民党的消极态度和官僚资本掠夺蚕食的严酷现实,民族工商界的代表人物开始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感到靠实业救国的理想并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不能为民族工商业拓展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既能在民主团结、和平建国中发挥作用,又能维护切身利益的政治组织。正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这件事在重庆的工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一九四九年九月,吴羹梅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证。

那时工商界对中国共产党缺乏足够的了解,对共产党所知不多,在许多问题上心存疑虑。毛泽东不计个人安危,只身来到重庆,使人们看到了共产党希望和和平的诚意。此后不断接触,工商界的同仁们特别是民族工商界,逐步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对共产党抱有好感的人越来越多起来。在这之中,毛泽东对工商界人士的三次接见和周恩来一次在星五聚餐会上有关经济的讲话,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8月28日下午,黄炎培到机场欢迎毛泽东来重庆后,异常兴奋地到胡厥文家中,介绍机场欢迎的场景和毛泽东的书面谈话。9月17日,毛泽东在曾家岩招待重庆部分工业界人士,包括刘鸿生、潘昌猷、胡西园、章乃器、范旭东和吴羹梅。几天之后,为了继续加深工商界对共产党的了解,也是出于礼节上的考虑,吴羹梅联络了5位工商界名人——胡厥文、李烛尘、吴蕴初、胡西园、章乃器,共同具名,在当时重庆的民主老人鲜特生先生的住宅宴请毛泽东。毛泽东偕董必武、王若飞到达。席间,气氛轻松活跃,很少拘束。进一步沟通了彼此思想和感情。

不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领导,又在中共代表团办事处邀请重庆工商界团体的负责人举行座谈会。会上,毛泽东分析了国内外的大好形势,提出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阐明了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发展道路,以及民族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应抱有的正确态度,等等。

这次座谈会,实际上是毛泽东在基本上了解了目前工商界的情况之后,针对所存在的问题,就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当时工商界所关心的问题进行的系统阐述,使之对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有一个概括的了解。毛泽东与工商界人士的3次交谈,在当时的工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消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的某些误解和疑虑,使工商界与共产党的距离大大地缩短了。随着形势的发展,建立新政党的筹备工作也进一步加快了。

9月11日晚,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章乃器、胡西园、吴羹梅等再次开会,讨论政党的筹备工作,由章乃器负责起草纲领。9月29日,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胡西园、吴羹梅、章乃器、孙起孟、章元善聚会,商定组织名称为“民主建国会”。10月3日,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杨卫玉、孙起孟、吴羹梅、章元善、李烛尘讨论通过了《民主建国会政治主张》。10月6日,黄炎培、胡西园、章元善、杨卫玉、孙起孟再次就政治主张和组织原则进行了讨论。

在紧张筹备的关键时刻,10月19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邀请,在星五聚餐会上发表了演讲,题为《当前经济大势》,肯定了工商界关心政治是个进步,这是星五聚餐会上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集会。那时,工商界对共产党关于战后的经济建设和对私营工商业政策也有些误解,毛泽东对此也做了一些解释。但比较详尽系统阐述了共产党的经济方针和政策,消除工商界大多数人心中的疑虑,还是周恩来这次在星五聚餐会上的讲话。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地、

全面地阐述自己的经济纲领和方针、政策,在当时的工商界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经过8年的抗战,工商界人士越来越认清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对它极度的不满和失望,希望能对另一派政治力量共产党有所了解。周恩来的这次讲话,使他们明白了共产党的政策,了解到共产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鼓励支持工商界的事业的。

此后,工商界人士和后来成立的民主建国会与共产党的关系越发地接近起来。民族工商界为实现和平、民主的政治斗争也越来越频繁和普遍地开展起来。周恩来的演讲对筹组民主建国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召开了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当天,有93人出席了成立大会。大会公推黄炎培、胡厥文、黄墨涵组成主席团。胡厥文致开会辞。大会通过了《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民主建国会章程》《民主建国会政纲》《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等重要文件,选举了民主建国会领导机关。从此,宣告了民主建国会的诞生,一个新的政党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

## 响应“五一口号”参加新政协

1948年5月1日,中共发表了“五一号召”,提出在解放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民建于5月23日在上海吴羹梅家以星五聚餐会的名义秘密举行了常务会、监事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黄炎培、胡厥文、施复亮、张伯、杨卫玉、盛丕华、俞寰澄、王纪华、陈巳生、盛康年、郑太朴等。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举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

会后,吴羹梅从自己的铅笔厂拿回油印机和钢板,连夜印刷了几百份“五一宣言”的传单,第二天由他的儿子吴乃昌将这些传单发放到各民建会员手中。自此,民建放弃了最初成立时“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在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中,最终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团结合作的立场。

吴羹梅一家五口于1949年元旦秘密离开上海,经株洲、广州转达香港。到港不久,吴羹梅就与潘汉年同志取得了联系,并见到了许涤新、连贯等人。1949年2月底,吴羹梅乘拉丁美洲一艘500吨的小轮船由港启程,2月25日,抵达烟台,然后乘敞篷卡车,经青州、天津于3月8日抵达北平。1949年4月,民建的理监事有10余人到达北平。4月12日,举行了到平的常务理事会。在4月22日举行的在平第三次常务理事会上,决定推黄炎培、盛丕华、章乃器、孙起孟和吴羹梅5人组成小组,代行总会常务理事会的职权。6月12日,经民建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决定,设立了总会北平工作委员会办事处,由孙起孟任总干事。8月21日,成立北平分会,南汉宸被任命为分会理事长。

1949年4月,吴羹梅作为团长,带领59位各界民主人士参加的“民主东北参观团”前往东北进行了40多天的考察,这是全国解放前夕首批到老解放区参观的团体,对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经济发展情况有

了深度全面的了解,进一步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并打算在哈尔滨建立一个公私合营的铅笔厂。1949年8月,吴羹梅以公私合营方式,联合创办了哈尔滨中国标准铅笔公司。该厂是中国最早的公私合营企业,引起世人瞩目。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吴羹梅应周恩来同志的要求回到上海协助上海解放稳定当地工商业生产的

工作。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正式成立,有7位产业界的民主人士陈叔通、盛丕华、李烛尘、包达三、张伯、俞寰澄(未到前,由鄧云鹤代表)和吴羹梅参加了筹备会的工作。吴羹梅回忆说:“当我这个来自国统区的一个中小工商业者首次步入庄严的大厅参与国家大事时,是何等的激动呀!我们这些在国民党统治下为争取民主权利而碰得头破血流的人们,如今堂堂正正地被共产党人请来参与国家大事。我们真正地感到了共产党的民主,感到了共产党人的可亲可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隆重开幕,吴羹梅作为工商界15名代表之一(代表陈叔通、盛丕华、李范一、李烛尘、简玉阶、包达三、姬伯雄、周苍柏、俞寰澄、张纲伯、吴羹梅、巩天民、荣德生、王新元、刘一峰。候补代表鄧云鹤、冯少山)参加了这次大会。

## 继续携手前进

改革开放后,吴羹梅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和两会工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参政议政、落实政策、开展咨询服务等项工作中,一直建言献策,特别是在中国制笔协会的成立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81年1月27日,在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召开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上,吴羹梅与人联名提出了《关于搞好我国制笔工业经济调整工作的几点意见和建议》的提案,提出了节约铅笔木材加快活动铅笔的试制工作,成立制笔工业协会等10个问题。1981年2月,吴羹梅和汤蒂因、徐正元在民建和工商联以及政协会议上提出成立中国制笔协会的提案,送交轻工业部。

1982年10月,轻工业部决定筹建中国制笔协会。在轻工业部贺志华副部长的主持下,经过紧张的筹备,制笔协会于1983年3月24—30日召开成立大会。在会上,吴羹梅和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担任米勒铅笔墨水笔厂副经理的刘晓同志一起被聘为协会的名誉会长。在大会的开幕和闭幕时,吴羹梅作了发言,表示希望与制笔界同仁一起,为制笔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尽努力。民建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全国工商联当时也对制笔协会的成立发出了贺词。

今年正好是中国制笔协会成立40周年,协会也已于今年6月2日在浙江义乌召开40周年纪念大会。纵观中国民族工商业和中国民主党派的发展史,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得到长久和持续的发展,而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和民主党派也在参政议政,经济发展建设等方面为国家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作者系民建北京市朝阳区第五支部委员)

## 文人轶事

何香凝

## 何香凝“以画为矛”

王剑

同盟会最早的女会员何香凝早年留学东京本乡女子美术学校,她学画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为革命的需要,绘制军旗、符号、告示和军用票图案”。回国后,她受岭南派画风影响,画出的梅、菊、劲松、狮虎,渐渐显出苍劲有力、威武雄强的气魄。

“大革命”失败后,何香凝发表声明,“辞去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避居江浙,以寒梅自比,体现出决不姑息、决不合作的态度。“为谁来补破山河,腕底烟云未等闲。收拾雄心归淡泊,时时曳杖款荆关。”何香凝画梅,遒劲古茂,秃笔硬毫画出老干的桀节,梅枝犹如铁笔一般。画中风正气清、铁骨铮铮的气势,让人顿生敬意。

抗战时期,何香凝多次向海外华侨宣传抗战形势,华侨每捐一笔款,她就送一幅画。为了给抗日将士们提供更多捐款,她亲自到南京找蒋介石。谁知蒋介石虚与委蛇,对捐款之事闭口不谈。回去后,何香凝气愤地将自己的一条旧

## 文人轶事

丰子恺

## 丰子恺“偷”诗

王吴军

李叔同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诗人、作家、音乐家和教育家,丰子恺跟随着李叔同求学期间,深得李叔同的赏识,丰子恺对于恩师李叔同的才华和人品也极其敬仰,师徒二人情谊深厚,惺惺相惜。

1928年2月,李叔同在杭州灵隐寺落发为僧,法号“弘一”,随后到浙江慈溪的伏龙寺做了客师和尚。第二年,弘一大师把自己一生的诗作精心挑选、认真誊写、汇编成册,却并没有交给出版社出版发行,而是将这些诗稿藏在寺院之中。

当时,作为弘一大师的得意弟子,丰子恺和史良、邹韬奋、沙文汉等人屡次上伏龙山拜见弘一大师,并多次恳求弘一大师,希望他能将诗稿拿出来,交给出版社出版。但是,丰子恺等人的恳求被性格特别耿直的弘一大师断然拒绝。于是,丰子恺等人

## 文人轶事

老舍

## 老舍客串说相声

周惠斌

1940年夏,重庆有一台为抗日劳军发起的募款文艺晚会,需要一出“帽戏”暖场。作家老舍自告奋勇,邀请梁实秋作搭档,友情客串一段相声以助兴。

老舍在北平的平民家庭长大,说得一口字正腔圆、干脆圆润的北京话,土音土语不折不扣,对相声颇有研究,他挑选了传统相声段子《新洪羊洞》《一家六口》,可手头没有本子,老舍就靠记忆背写了脚本。

排练时,老舍向梁实秋面授机宜,介绍要领:“说相声第一要沉得住气,放出一副冷面孔,永远不许笑,而且控制住观众的注意力,用干净利落的口齿,在说到紧要处,使出全副气力,斩钉截铁一般迸出一句俏皮话,则全场必定爆出一片彩声,哄堂大笑……”梁实秋听了老舍的鼓励,慢慢打消了心里的疑虑。

表演那天,两位文学大师粉墨登场。他们穿着纺绸大褂,手拿折扇,走到台前,一胖一瘦,恭恭敬敬地向台下观众深深一鞠躬。随后绷着脸,面无表情

## 文人轶事

洪深

## 洪深和文字改革

刘兴尧

洪深是我国著名的戏剧家和电影艺术的开拓者,他还对我国的文字改革作出了不菲的贡献,1935年7月,洪深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千一百个基本汉字使用教学法》——献给推行识字运动的众位先生,他的老乡赵元任是中国文字改革的先驱,洪深也对文字改革有浓厚的兴趣,但是,从洪深写《平民戏剧》开始,他就对底层民众,也就是大众产生了更多的关注。

洪深是个戏剧家,在那个识字并不普及的年代,戏剧本来就担负着教化民众的作用,很多大字不识的平民,就是通过看戏,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和一些基本常识,比如“忠臣孝子人人敬,奸臣贼子人人恨”等,甚至有的老百姓看到兴奋处,还爬上舞台,把演员痛打一顿。而洪深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写了《一千一百字》,其目的就是为了

裙子寄给蒋介石,并附赠诗一首:“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何香凝的画作立意讲究,雄浑道逸,别具一格。她的画作《狮》中,一头雄狮伏地而卧,目光炯炯,雄视前方。狮子嘴边的触须直如钢针,浓密的毛发顺颈部披落。真可谓“国魂招得睡狮醒,绝技金国妙铸形”。毛泽东曾对何香凝赞不绝口:“先生之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

新中国成立后,何香凝的梅兰竹菊图一扫悲愤压抑之情,时常流露出安适祥和之气。刘少奇、董必武、陈毅、沈钧儒等人都欣然在其画作上题词、补笔,不仅给何香凝的晚年生活增添了乐趣,也给中国画坛留下了佳话。董必武在其“山水图”上题诗曰:“眼观山水形,手写山水神。形神皆毕肖,山水若逼真”;陈毅也称赞其画作的高超技艺:“画树重高洁,画花喜独步;大师撮其神,一纸皆留住。”

便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法。当时,弘一大师有一个小徒弟,才8岁,这个聪明伶俐,深受弘一大师的宠爱,生得小徒弟经常出入弘一大师的禅房。丰子恺等人就用糖果和橘子等食物诱惑弘一大师的这个小徒弟,叫他偷偷拿出了弘一大师的钥匙,然后,丰子恺把弘一大师的诗稿“偷”了出来。

随后,丰子恺把弘一大师诗稿中的每一首诗都配了画,由邹韬奋负责,交给当时的商务印书馆以最快的速度编辑出版,书名叫作《护师录》。《护师录》一书出版后,丰子恺将新出的书和18700元稿费都寄给了弘一大师。

弘一大师知道此事后,十分恼火,他立刻写信把丰子恺狠狠骂了一顿,使丰子恺从此再也不敢上门面见弘一大师,直到弘一大师在福建病逝后,丰子恺才来到弘一大师的灵前缅怀恩师,痛哭不已。

情,泥雕木塑一般直挺挺地站在台上不开腔。这时,观众早已乐不可支,笑得前仰后合。只见老舍用手扇子向台下一指,全场立即安静了下来。老舍用道地的北京话开言道:“刚才那个小姑娘的洋歌唱得不错。”梁实秋说:“不错!”台下一阵哄笑。“现在咱们两个小小子儿伺候一段相声。”台下又是一阵笑声,观众的注意力已被他们牢牢抓住。他们每说一句,就抖一个包袱,有时你敲我的肩,我戳戳你的头,观众笑声不断。

当表演到用折扇敲头的时候,老舍一激动,按照老相声的章法,举起折扇“狠狠”地向梁实秋的头顶打去。梁实秋一看,急忙向后躲闪,结果脑袋躲开了,老舍的折扇却一下子把他的眼镜打了下来。梁实秋反应敏捷,本能地两手一捧,恰好用手接住了落下的眼镜,然后在空中托住不动,傻站在舞台上不知所措……

台下观众看到这里,以为这是有意安排的“绝活儿”,顿时笑声鼎沸,掌声雷动。有人觉得不过瘾,甚至大声叫道:“再来一个!”殊不知这一精彩表演,其实是两人的“失手偶得”。

让大众掌握这1100个汉字,知道他们的基本用法,这样,他们就能够看懂报纸、看懂布告,就能够应付身边发生的事,所以,这1100个汉字,是洪深精心挑选的,最重要的是后面半句:献给推行识字运动的众位先生,说明洪深对推行识字运动,也就是平民识字运动,是非常推崇的,而且他对就业业推行识字运动的众位先生,也是万分景仰的。